

西班牙金融机构早期发展中的礼物逻辑与社会资本

[墨] 吉尔曼·斯卡尔佐(Germán Scalzo)

[西] 安东尼奥·阿尔马塞吉(Antonio Moreno Almarcegui)*

陆晓禾 杜 晨 译

[提要] 本文以宗教与经济学为研究对象,更具体地探讨了互惠、社会资本与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关系。自现代性发端以来,主要由于新教的影响,礼物与契约逻辑在完全独立的领域中运行,使得契约关系成为唯一可能的社会模式。我们将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市场与国家的发展和功能都是先前某种事物即礼物在社会关系中出现的结果。这也是所谓的“社会资本”的基础。我们将研究西班牙的案例,特别是14—19世纪慈善机构的创建演变,作为构建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以便更好地将礼物逻辑与经济发展相联系。我们增加了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即为礼物至上的辩护是否阻碍了现代西班牙经济以最具活力的新教国家相同的速度发展。

一、导 言

埃纳夫(Hénaff, 2010)最近又回到了韦伯(Weber, 1955)提出的一个有关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老问题,从社会的角度发展了他的论点。埃纳夫提出,按新教的社会愿景,有着对契约作为公共社会关系排他性框架的辩护,这种辩护完全脱离了礼物的逻辑,而这正是新教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埃纳夫断言,对于新教而言:

……完成职业任务比从事慈善工作更重要;前者甚至取代了后

* © Germán Scalzo & Antonio Moreno Almarcegui, 2020.作者吉尔曼·斯卡尔佐,墨西哥泛美洲大学(Universidad Panamericana)教授;作者安东尼奥·阿尔马塞吉,西班牙纳瓦拉大学(Universidad de Navarra)。——编者

者。路德甚至认为,劳动分工本身就履行了对他人的义务(PE 81)。在韦伯看来,路德在某种程度上天真地预示了亚当·斯密。实际上,他并不是那么天真的,因为当时人们所质疑的是把慈善态度作为社会观点首要条件的整个问题(韦伯对此并未提及)。

这一学说影响深远,一方面出现了一种完全以交换关系,如工作、价格和合同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基于一种将恩典视为单方面神圣礼物的新概念,“现代”礼物概念出现了,即无条件的道德礼物是一种纯洁和慷慨的礼物,不期待回报(没有互惠)。因此,它最终使博爱的概念普遍化,同时也使它没有了具体的内容,而在此之前,这些内容是由酬金来规定的(Nelson, 1949)。

在产生新教的社会中,礼物逻辑与契约逻辑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领域。这一学说使受交易逻辑支配的契约关系成为唯一可能的社会模式,而把礼物逻辑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

对这一主张契约的激进自治的传统,现代天主教世界观,根据早期的传统,继续捍卫礼物优于契约,也就是说,分配正义优于交换正义。对一些作者来说,契约之从属于礼物对于天主教世界观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新教世界扩展的关键在于礼物与契约的彻底分离,礼物被简化为私人关系,而契约则成为公共社会关系的主导社交形式。这种关系在天主教的世界观中受到了质疑,在现代世界,礼物与契约仍然是统一的,这使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不可能(Clavero, 2000)。

诚然,礼物与契约之间的混淆是许多形式的强力腐败的基础,因此对每个社会都构成了风险,特别是对那些提倡礼物与契约之间牢固关系的人。但通常在这些情况下,将一种东西作为礼物来赠予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自利的行为,而“免费”提供的东西具有实在的价格,一个强有力的还盘。然而,中世纪晚期的传统很清楚地将它们区分开来。所有关于高利贷的基于案例的推理都需要努力确定哪一部分符合契约关系,哪一部分是免费的。换句话说,它试图确定哪部分是出于友谊,哪部分是出于公正。然后说,没有公正,也不可能友谊。这是因为友谊高于公正,而礼物高于契约。

二、探讨问题:礼物逻辑、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社会学中产生的与社会资本有关的理智传统(Putnam, 2003a),最近又从一个有点不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回到了这个古老的问题上。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也就是对“社交网络和与

之相关的互惠性规范”的研究(Putnam, 2003b)。对普特南来说:

密集的社会互动网络似乎促进了强大而普遍化的互惠规范:现在,我为你做了一些事情,但并不期待立即得到回报,因为以后你会回报我的善意(如果没有,其他人也会)。换言之,社会互动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鼓励人们在可能不会有信任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当经济的和政治的关系嵌入到一个密集的社会互动网络中时,就会减弱机会主义和腐败的激励机制(Putnam, 2003b: 14)。

这种方法的原创性就在于,它试图从制度性的构架来衡量互惠网络的强度,这构架指导着社会各个战略性部门——政治、教育、劳资关系、宗教密集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有益于社会中形成一种普遍的信任和善意的氛围。

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衡量和解释这种制度构架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因为与此同时,这些制度有助于建立并表达“润滑社会生活”的信任。这种方法事实上基本接近中世纪晚期的观点。确实,如果社会资本尝试将量化方法应用于礼物逻辑的现象,为的是客观地衡量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强度和力度,那么断定社会资本的相关性就是肯定礼物与契约之间、无偿性与市场发展和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创造足够的社会资本来维持普遍的社会信任。

我们的论点是,市场和国家的正常运作和历史发展(这也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的话题),实际上是先前某种更复杂和难以确定的事物的结果,与此同时也使之成为可能。事实上,这些制度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平衡的结果,只有广泛和深刻信任的气氛才可以让其发展。这正是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所指。假设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社会长期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网络,作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强互惠规范的表达,它表达的是一种广泛的信任氛围,使经济制度和稳定有效的政策得以出现。换句话说,最重要的不是经济机构本身,而是使它们成为可能的安全和信心的社会网络。因此,经济发展的长期关键是创造足够的社会资本来维持一种普遍的信任氛围。

在现代,由于出现了中世纪闻所未闻的大城市,使欧洲的商业扩张成为可能。这些大城市负责推动和组织贸易,导致出现全新体量和质量的国际和国内市场(De Vries, 1980)。

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大城市是通过移民而发展起来的,这就带来了无根的问题:新城市如何才能避免负面的社会后果,而让新来者融入社区,成为社区的一员呢?

因此,这些大城市见证了一种新型关系的诞生,这种关系更加非个人的、

中立的和客观的,这对市场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市场的发展来说,必须扩大基于交换正义的契约关系,交换正义坚持交换物的等值,但忽略了主体的条件。

现代国家的发展对于交换正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公共领域中关系发展的核心标准。但是,无论是大规模的移民还是基于现代法律概念的契约关系,都无法产生个人认同,从而建立个人关系,而个人关系最终是社会凝聚力的基础(Revue du Mauss, 2004: 23; Hénaff, 2010)。相反,它们创造了一个不被承认的世界,成为紧张关系的潜在根源,最终可能蔓延到整个社会,并使得国家的社会发展陷入瘫痪。这些新的社会机构的历史意义在此被研究:它们计划将礼物和互惠的逻辑从自然社交圈,即家庭、邻里、友人的圈子,扩展到大城市创造的新的社会环境。简言之,这些机构的历史意义在于,在社会承认的构架内插入新的非个人的关系:接受和承认他人,扩大关系的范围,并为有助于和平与社会稳定的普遍信任的氛围作出贡献。只有这样的环境才有可能出现新的金融机构。

社会资本的密集流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大都市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然而,大城市资本的减少可能导致城市增长的衰竭或崩溃,从而导致贸易恶化和经济增长长期疲软。

在这些假设下,我们下文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对礼物首要地位的捍卫,是否阻碍了现代西班牙以速度与最具活力的新教国家相同的经济发展?对礼物至高无上地位的捍卫,是否阻碍了现代西班牙经济以与大多数富有活力的新教国家相同的速度发展?此外,有可能衡量西班牙历史上社会资本的密集度吗?如果可能,在资本主义出现和发展的相应时期,它是如何演变的?西班牙的大城市是否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资本来弥补新的社会环境?最后,这种演变能否解释西班牙经济发展中的扩张和危机时期?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区分大都市(马德里和塞维利亚-加迪斯轴线)与西班牙其他地区之后,首先研究作为社会资本建设指标的慈善机构创建的一般演变。因此,我们可以更好地把礼物、社会资本和商业革命联系起来。然后,我们将分别研究以服务形式提供帮助的机构,主要是医疗和教育,以及以金钱形式提供帮助的机构,如嫁妆、布施、寡妇养老金或奖学金。尽管这两类机构在17世纪中期都遭遇了危机,但这些提供资金的机构在19世纪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因此这项研究存在很大分歧。此外,这样的划分使我们更好地将礼物逻辑、社会资本创造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最后,我们将使用定性的方法来概述在每个历史时期激励这些机构的互惠规则。

三、慈善事业在西班牙作为社会资本的指标：14—19 世纪

20 世纪初,西班牙政府列出了一份慈善机构的清单,这些机构是几个世纪以来通过社会倡议而产生的,并一直存在到现在。这份清单包括大约 1.3 万个非常不同的机构(医院、疗养院、招待所、婚嫁或研究补助金、学校、粮仓、基金(montepíos)、储蓄等),将成为我们分析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①尽管这份清单并非详尽无遗,但它包含了一个足以代表本研究目的的样本。从 1450 年至 1900 年,社会机构数量的演变如图 1 所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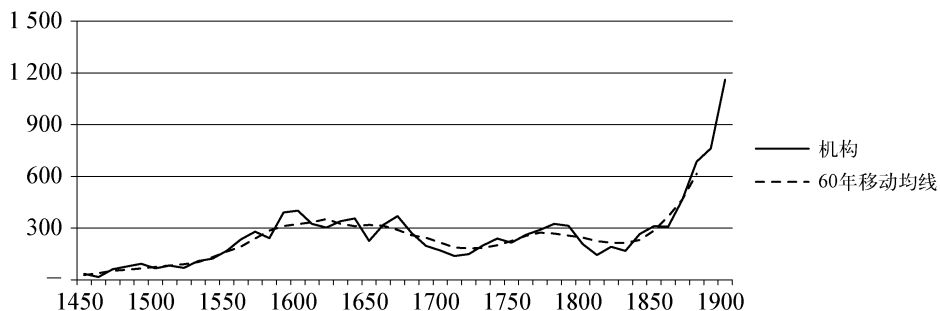


图 1 1450—1900 年西班牙慈善机构建立情况

图 1 中可以区分 3 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包括两个世纪(15 世纪和 16 世纪),特点是机构的增长,从 1600 年到 1610 年(正好是西班牙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一直持续到 1650 年;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危机,包括之后的 2 个世纪(1650—1850 年);第三个时期,是 1850 年以后的迅速发展期,到 1870 年超过了以前的水平。这两个增长期(1400—1650 年和 1840—1900 年)与西班牙历史上最辉煌时期相吻合,包括西班牙文化的“黄金时代”和广泛的政治、社会改革运动(“复兴主义”)。然而,与这些机构应对的人口总数相比,第一个时期显然更好。

现代时期,马德里、塞维利亚和加的斯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它们集中了推动创造大型市场的战略功能,而这些市场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关键。马德里是新君主制的首都,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则是与美洲进行国际贸易的港口城市(De Vries, 1987)。如果将这些大都市中人均机构的变化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则都市的创建速度几乎是其他地方的 6 倍(每 1 万居民有 1.62 个机构,而

^① 这项数据以 10 年为单位,加上 60 年的移动平均值。这个时期达 560 年,使我们能够观察中期和长期的趋势。本文对这些数据作了一般性的处理,但更详细的研究见 Moreno-Scalzo(2016)。

其他地方仅有 0.28 个)。此外,危机时期在大城市要严重得多,显示出城市危机与社会资本恶化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如前所述,这里所考虑的机构是非常混杂的。然而,它们可以分为两类:提供服务的(主要是医疗和教育),与提供捐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服务的机构往往趋于更加稳定,而以金钱形式提供帮助的机构则经历坎坷。在扩张时期(1550—1650 年,1850—1900 年),后一种机构的发展比前一种机构更为强劲。然而,这两个时期机构的构成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第一个时期,机构规模小,靠个人的主动性建立起来;而在第二个时期,由公司运营并由资本推动的大型机构占主导地位。

以金钱形式提供的帮助与提供服务的不同——给予受助者更大的灵活性,反映出对其正确使用有更大的信任。慈善机构的扩张与捐款机构的扩张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图 2 显示了这种相关性。我们的假设是,社会机构的创建是一个特定社会在一个特定时间中的礼物逻辑强度的反映,即有信心和密集的货币流通要求有普遍的信任氛围,并为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金钱是礼物逻辑的一种表达。根据普特南的观点,“一个以普遍互惠为特征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感的社会更有效率,就像金钱比物物交换更有效率一样。信任是社会生活的润滑剂”(2003: 14)。普遍的互惠和金钱都是一种信心气氛的表达,这种信心能柔化和放松社会生活。西班牙的经验表明,金钱可以强有力地表达一个社会的“普遍的互惠”。J. 努南(Noonan)认为,经院哲学认为金钱是一种礼物,是建立在这种逻辑支配下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的(Noonan, 1957: 104),这种观点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存在。因此,慷慨和有信心地使用金钱可能是礼物逻辑强度的最有力的标志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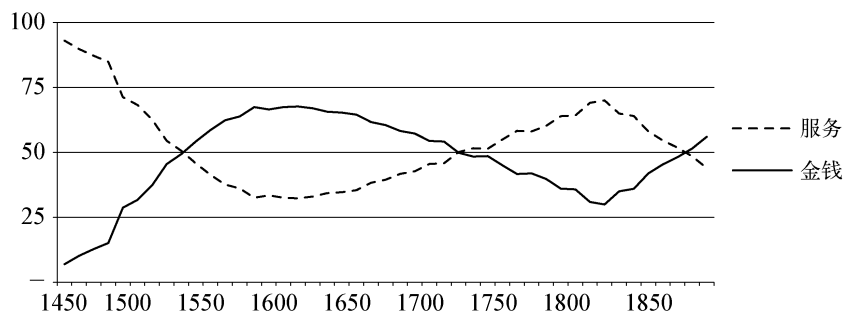


图 2 以金钱或服务形式提供支持的机构的相对分布

1650—1850 年的危机主要是由捐赠资金的社会机构的收缩引起的。需要明确的是,这是一个普遍丧失信任的迹象。图 2 显示,正如普特南在他的比较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信任的普遍缺失等同于礼物逻辑和互惠的恶化。捐款的社会机构显然对短期社会变化最敏感:它们在经济景气时出现得更快,而在危机时衰败得更厉害。这些提供金钱的机构是 1650—1850 年时期危机的表现。最后,对慈善机构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即慈善事业的发展似乎与金融机构的发展密切相关。至少从现代开始,慈善机构和金融机构的扩展需要一种信任的社会氛围。

除了这里的定量分析(作为社会互惠指标的机构数量)外,社会资本概念还包括一个很难确定的定性方面,即互惠概念的强度和质量。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把那些不打算将受助者作为这个社会正式成员的机构与那些设法把受助者变成“平等者”的机构区别开来。尼尔逊(1949: 163)认为,到 18 世纪,欧洲新教国家的慈善观念开始恶化。在这个新概念中,慈善变成了为了某些被视为“下等人”所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接受慈善对于受助者来说是某种羞辱的行为,包括对自己社会地位低下的公开承认。在这种行动中,虽然客观上需要帮助,但并没有改变社会差异的愿望。简言之,它的目的不是将受助者作为一个成员、一个“兄弟”、一个最终是平等的人纳入这个社会。我们认为这是互惠性概念在质上的恶化。

在西班牙政府的研究中,与援助可能被称为“困者”的机构相比,致力于“穷人”的机构持续而稳定地增加。我们认为,“困者”这个术语是指由具体和客观的情况所造成的暂时状态,慈善机构将设法来补救。而“穷人”指的则是更有结构和更持久的社会经济状况,慈善机构不一定尝试补救,而是试图减轻这种状况。^①

“困者”并不对应某一个社会范畴,而是一种具体境况,而“穷人”似乎指的是一种永久的社会状态。因此,为穷人而设立的机构所占百分比的增加与互惠关系普遍恶化有关。慈善机构对公众态度的这种变化揭示了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的不对称差异,表明了一种社会距离感和一种不希望他人平等的对待。直接增加专门为“穷人”服务的机构,间接地表明礼物逻辑特有的互惠概念在质上的恶化。这种演变的相对分布如图 3 所示。

^① 这两者的区别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救急”与“救穷”的区别,所谓“救急不救穷”,这里也有这个意思。——陆晓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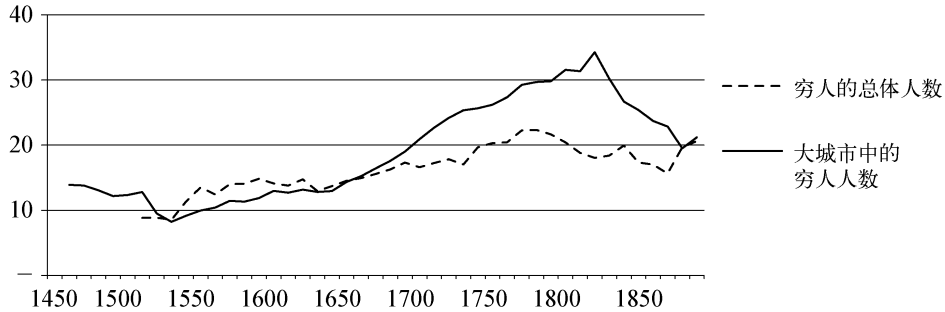


图3 穷人的相关分布

这种恶化虽然普遍,但在大都市中更为严重,在社会机构创立的关键时期(1820—1830年)取得了更大的相对重要性。它对应于旧政权向新政权的过渡时期。正如历史学家指出的,这些数据表明,这种政治过渡伴随着互惠关系的严重恶化,这种恶化影响了社会资本的形成。这一关键的10年对应着一个人均机构数明显减少的时期,也对应着支持这些机构的互惠质量的下降。

1820年社会资本的创造发生进一步恶化,这与西班牙的严重危机相对应,特别是在马德里-塞维利亚-加的斯地区,这是西班牙现代社会的中心。这可能与当代西班牙在其他城市的复兴有关,而这些城市以前只起了很小的作用(Ringrose, 1996)。

四、结 论

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在西班牙,自天主教国王开始到1550—1650年达到顶峰的一段特别成功的时期之后,社会资本的形成本面临着—场危机,这场危机持续了200年,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与旧政权的结束和自由国家的出现是一致的。

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不仅表现在人均慈善机构数量的显著减少——尤其是在现代西班牙的大城市,而且还表现在推动这些机构的互惠概念的恶化。一开始,友爱概念占主导地位,而在这个过程结束时,有相当大比例的社会机构,尤其是在大城市,都聚焦“穷人”,也就是说,这一质的区别反映了社会被各种不可调和的差别所分裂。

在马德里和塞维利亚-加的斯轴线城市中,社会资本创造的兴衰更为剧烈,这些城市注定要推动西班牙的商业革命,使该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

化,促进西班牙经济的整体增长。与欧洲其他更具活力的经济体相比,这些城市的危机解释了西班牙社会整体增长乏力的原因。大型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创建和金融体系的发展,需要有普遍的社会信任作为先决条件,因为新的大城市的规模,不再能依赖古老的亲属关系网络和中世纪典型的邻里关系。所以,1550—1650年大城市中社会机构的大幅增加,伴之以急剧的城市繁荣,其历史意义是,扩大了互惠互助网络,超越了团结一致的传统圈子,形成了广泛的社会信任气氛,改变了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相反,随后1650—1850年的危机显示了社会资本创造的缓慢和稳固的恶化,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导致了与欧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相比相当平庸的经济和城市增长。

回到与契约逻辑有关的礼物逻辑,在现代西班牙,契约并没有失灵。事实上,西班牙促进了当时法律学说的发展,以至于有人认为,萨拉曼卡学派对当代文化的主要贡献之一与现代契约概念有关(Gordley, 1991)。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而社会资本的创造,也就是所谓的“礼物逻辑”却失败了。也许这是因为契约不是自我维持的,而是需要某种先决的东西,这种东西本身不能包含在契约中,但在社会中却是真实的、具体的。它表现为广泛的社会信任,广泛的慷慨的信任的互惠网络,这使得建立机构、签订合同、促进资金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快速和广泛的流通变得容易。确实,尽管资本形成方面的危机影响了所有机构,但我们已经表明,这对以资金形式提供帮助的机构尤为严重。在1650年以前,这类机构增长最快,1650年后这类机构萎缩最多。考虑到西班牙可以直接获得贵金属资源,这是自相矛盾的,但这不是问题所在。相反,现代新场景在大都市和大型市场所创造的货币广泛而密集的社会流通,需要扩大广泛的信任和慷慨的社会关系网络,超越亲属范围和邻里社区,这有助于养活所考察的社会机构。这种信任和普遍的慷慨是使金钱在社会机构中流通并赋予它生命的力量。1450—1910年的资本创造表明,广泛而普遍的社会信任在1650—1850年遭受了严重损害。我们认为,这是该国社会生活因普遍信心恶化而普遍失控的表现。

参考文献

Anes, Gonzalo. 1972. *Economía e Ilustración en la España del siglo XVIII.*, Barcelona, pp.73 - 94.

Clavero, Bartolomé. 1991. *Antídora: Antropología Católica de la Economía Moderna*, Milán, Giuffrè.

De Vries, Jan. 1987. *La Urbanización de Europa 1500 – 1800*. Crítica, Barcelona.

Gordley, James. 1991.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Modern Contract Doctrin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Hénaff, Marcel. 2010. *The Price of Truth. Gift, Money, and Philoso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Original: (2002) *Le Prix de la Vérité. Le don, l'argent, la Philosophie*, Editions du Seuil, París].

Hénaff, Marcel. 2003. Religious Ethics, Gift Exchange and Capitalism, en *Arch. Europ. Sociol.*, XLIV, 3: 293 – 324.

Ministerio de la Gobernación, (1912 – 1918) *Nuevos Apuntes Para el Estudio y la Organización en España de las Instituciones de Beneficencia y de Previsión*, Imp. Sucesores de Rivadeneyra, Madrid, 1912 – 1918. *Índice General de las Instituciones de Beneficencia en España*, pp.1 – 408.

Moreno Almarcegui, Antonio & Scalzo, Germán. 2016. *Lógica del don, Capital Social y Capitalismo. El caso de España. Siglos XIV – XIX*, en *Homenaje a Jesús Longares*, EUNSA, pp.83 – 117. Forthcoming.

Nelson, Benjamin N. 1949. *The Idea of Usury. From Tribal Brotherhood to Universal Otherho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onan, John. 1957. *The Scholastic Analysis of Us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utnam, Robert D. (2003a) *El Declive del Capital Social. Un Estudio Internacional Sobre las Sociedades y el Sentido Comunitario*, Galaxia Gutenberg, Barcelona.

Putnam, Robert D. & Gross, Kristin A. “Introducción”, Putnam, R. D. (2003b) *El Declive del Capital Social. Un Estudio Internacional Sobre las Sociedades y el Sentido Comunitario*, Galaxia Gutenberg, Barcelona, pp.7 – 33, p.9. *Revue du Mauss*, (2004) *De la Reconnaissance. Don, Identité et estime de soi*, *Revue du Mauss*, 1er Sementre, No.23. Ringrose, David (1996) *España, 1700 – 1900: el mito del Fracaso*, Madrid, Alianza.

Weber, Max. 1955. *La Ética Protestante y el Espíritu del Capitalismo*, Madrid, *Revista de Derecho Privado*.